

## 秦汉与罗马

2020-09-07 来源：中国网 作者：潘岳



铜车马，秦，青铜器，1980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，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。铜车马完全模仿真车真马制作，尺寸为实物一半，由四马系架，为秦始皇卤簿开道、担任警戒任务

### 结篇

吕思勉说，“秦汉之世，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”。对此转变，誉者赞为“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”，毁者谤为“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”。

“东方专制主义”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，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，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，不需遵循任何法律。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，仅限于埃及波斯；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，仅限于蒙古沙俄，对“东方之东”的中国，几乎毫无认知。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“专制”二十多年前（公元前350年），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“编户齐民”、“一统于法”的郡县制度。

欧洲最初了解中国，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，形成了短暂的“中国热”。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；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；淑女养金鱼，命妇乘轿子。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。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“崇华派”。

他想“托华改制”，把自己的书房称为“孔庙”，给自己取笔名叫“孔庙大主持”；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“科举取士”类似柏拉图的“哲学王治国”；魁奈认为“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，皇帝也要审慎遵守。”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“贬华派”，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“绝对王权”，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。同样是君主统治，西方人可以叫“君主制”（monarchy），而中国人只能叫“专制”（despotism）。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，而中国没有。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（“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”），不了解相权分治、行封驳事、史官监督、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。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，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。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“东方专制”进行批判。他说，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，也要远胜于“东方专制”[77]。再后来，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，东方天然落后、停滞、奴役；西方天然进步、自由、文明。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，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，没有一人去过中国，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，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，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“东方文明”。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，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。

除了“东方专制”这条脉络，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。比如马克斯·韦伯。他说中国是“家产官僚制”，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，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，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“官职俸禄”的投资，期待成为“包税人”，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。这不符合基本史实。从汉代开始，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（大司农）和皇家财政（少府），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，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。从秦朝开始，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，“包税人”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。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、与军队、与包税人的关系。对这类误判，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，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。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。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。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，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。

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。中国近代以来，许多改革者都在“自由”与“专制”间挣扎。如梁启超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先后写了《拟讨专制体檄》与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》，一边说“专制政体者，我辈之公敌也”，号召人民“破坏而齏粉之”；一边又承认，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、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，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。之后，他访问美国，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“彼中国者老朽垂死，欧

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，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”时，彻夜不眠“怵怵焉累日，三复之而不能去”（《新大陆游记》，1903年）。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《开明专制论》（1906年），说中国古代儒、法、墨三家都是“开明专制主义”[78]，儒墨重民本，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；法家重国本，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。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，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，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。

秦汉与罗马，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，各有高峰低谷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，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。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，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，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。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，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；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，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。

罗马之独特价值，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。罗马史家林托特说，“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、成就伟大。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：界限之内，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”。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，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，又没有“一体”来予以调节，最终导致大分裂。“冲突政治”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。西方史学家们认为，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，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“界限”而开始崩裂。罗马之衰落，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。

两汉的独特价值，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。一体保证凝聚，多元保证活力。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。当一体完全压倒多元，就开始僵化。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，就开始分裂。秦亡于“法家压倒一切”，西汉亡于“儒家压倒一切”，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。如何同时驾驭“一体”与“多元”，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。

在真实的世界里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，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。制度发挥好坏，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。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，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，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。今天，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，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。

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。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“现代化”和“重新审视自己”的痛苦中。然而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，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。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，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。

东方和西方，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，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。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。

**\*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一书的序言。**

**注释：**

[1] 参见：福山著，毛俊杰译，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版；福山著，毛俊杰译，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版。

[2] 参见：H. L. Lee.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. Foreign Affairs, 2020, 99 (4) : 52—64.

[3] 参见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：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——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，第4—35页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：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，第8—25页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里耶发掘报告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7年，第179—217页。

[4] 参见：陈伟主编，《里耶秦简牍校释（第1卷）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版，第7页。

[5] 参见：《里耶秦简·吏物故名籍》，简8—809；简8—1610；简8—938+8—1144。

[6] 参见：A. H. M. Jones, The Later Roman Empire, Blackwell, Oxford, 1964, 284—602.

[7] 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309页。

[8] 参见：芬利著，晏绍祥、黄洋译，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VII页。

[9] 马基雅维利认为，是“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”。参见：马基雅维利著，冯克利译，《论李维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56页。

- [10] 参见：Nic Fields, *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–31 BC*, p. 53.
- [11] 参见：特奥多尔·蒙森著，李稼年译，《罗马史》（第四卷）商务印书馆，1994年版，第287页。
- [12] 参见：Nic Fields, *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–31 BC*, p. 53.
- [13] 参见：崔瑞德、鲁惟一编：杨品泉等译，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211页。
- [14] 参见：H. F 乔洛维茨、巴里·尼古拉斯著，薛军译，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3年版，第4页。
- [15] 参见：马基雅维利著，冯克利译，《论李维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42页。
- [16] 参见：芬利著，晏绍祥、黄洋译，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83页。
- [17] 参见：马基雅维利著，冯克利译，《论李维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43页。
- [18] 参见：芬利著，晏绍祥、黄洋译，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140页。
- [19] 参见：西塞罗著，王焕生译，《论共和国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页。
- [20] 参见：普罗塔克著，席代岳译，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（下），吉林出版集团，2009年版，第1581页。
- [21] 参见：Cassius Dio, *The Roman History: The Reign of Augustus*, Penguin, 1987.
- [22] 参见：伊丽莎白·罗森著，王乃新等译，《西塞罗传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版，第262页。

[23] 参见：罗纳德·塞姆著，吕厚量译，《罗马革命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212页。

[24] 参见：罗纳德·塞姆著，吕厚量译，《罗马革命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257页。

[25] 参见：罗纳德·塞姆著，吕厚量译，《罗马革命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版，第19页。

[26] 参见：塔西佗著，王以铸、崔妙因译，《编年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1年版，第3页。

[27] 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。参见：特奥多尔·蒙森著，李稼年译，《罗马史》（第四卷），商务印书馆，2017年，第447页。

[28] 公元前43年，安东尼、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，达成协议，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。是年11月，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，授权同盟颁布法令和任命高级官员，统治国家5年。

[29] “就是这个屋大维——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‘奥古斯都’的称号——通常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”。参见：H. F 乔洛维茨、巴里·尼古拉斯著，薛军译，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3年版，第4页。

[30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2344页。

[31] 参见：蒙文通著，《蒙文通文集·古学甄微》，巴蜀书社，1987年版，第284页。

[32] “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；岁恶不入，请卖爵子”。参见：贾谊著，《贾谊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第201页；“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”，参见：晁错集注释组，《晁错集注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第31页。

[33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2352页。

[34] 西汉初年，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，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。而诸侯大的如齐、楚、吴等，每人都有五六个郡，几十个城。汉景帝时，吴楚

七国之乱。汉武帝时，也有淮南王、衡山王之乱。

[35] 参见：凌曙注，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第273页。

[36] “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，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，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，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，义矣夫”。参见：凌曙注，《春秋繁露·精灵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第98页。

[37] 参见：凌曙注，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第274页。

[38] 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918页。

[39] “春秋刺上之过，而矜下之苦，小恶在外弗举，在我而诽之。以仁治人，以义治我，躬自厚而薄责于外，此之谓也。”参见：凌曙注，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第313页。

[40] 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913页。

[41] “吏民有明当世之务，习先圣之术者，县次续食，令与计偕”。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17页。

[42] “一条，强宗豪右，田宅逾制，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。二条，二千石不奉诏书，遵承典制，倍公向私，旁诏守利，侵渔百姓，聚敛为奸。三条，二千石不恤疑狱，风厉杀人，怒则任刑，喜则任赏，烦扰苛暴，剥戮黎元，为百姓所疾，山崩石裂，妖祥讹言。四条，二千石选置不平，苟阿所爱，蔽贤宠顽。五条，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，请托所监。六条，二千石违公下比，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，割损政令”。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623—624页。

[43] “卜式拔于刍牧，弘羊擢于贾竖，卫青奋于奴仆，日磾出于降虏，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儿宽，笃行则石建、石庆。质直则汲黯、卜式。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。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，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，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

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，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，其余不可胜纪。”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1998—1999页。

[44] 参见：黄展岳，《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》，考古与文物，1996年第2期。

[45] 参见：郑君雷，《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》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第40卷第2期，2018年3月。

[46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100页。

[47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1492页。

[48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662页。

[49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1437页。

[50] Edward R.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，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（the Huns）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。参见：Nicola Di Cosmo, Neil Pederson, Edward R. Cook: “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: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(744–840) with Paleoclimate Data,” *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*, XLVIII: 4 (Spring, 2018).

[51] “上怒，欲斩长安令……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”。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113页。

[52] “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……今纵不能，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，虚府库赏赐，发良民侍养，譬若奉骄子。……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”。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113页。

[53] 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622—7623页。



[54] “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赍贷子钱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”。参见：韩兆琦译注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7620—7621页。

[55] “战士或不得禄，而山东被灾，齐赵大饥，赖均输之畜、仓廩之积，战士以俸，饥民以赈”。参见：王利器校注，《盐铁论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第27页。

[56] “有者半贾二卖，无者取倍称之息”。参见：晁错集注释组注，《晁错集注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第31页。

[57] 秦汉的土地制度中，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“公地”和个人拥有的“私地”。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，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，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。北魏和隋唐之盛世，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；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，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。

[58] “车马衣服之用，妻子仆养之费，量入为出，俭节以居之；俸禄赏赐，一二筹策之，积浸以致富成业”。参见：王利器校注，《盐铁论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第219—220页。

[59] 参见：王利器校注，《盐铁论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第595页。

[60] 参见：Nic Fields, *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—31 BC*, p. 53.

[61] 参见：钱穆著，《国史大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版，第128页。

[62] 参见：芬纳著，马百亮、王震译，《统治史》（卷一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362页。

[63] 参见：佩里·安德森著，郭方译，《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137页。

[64] 参见：弗雷德里克·库珀著，柴彬译，《世界帝国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7年版，第32页。

[65] “学史书、读律讽令，治作情奏，习对向，滑习跪拜”。参见：黄晖撰，《论衡校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版，第1123页。

[66] “郡国曰学，县道邑侯国曰校，校、学置经师一人”。参见：颜师古注，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，第248—249页。

[67] 参见：Cassius Dio， lxxiv， 17． 5； Historia Augusta， DidiusJulianus， 8． 8．

[68] 参见：孟德斯鸠著，婉玲译，《罗马盛衰原因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5年版，第48—49页。

[69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王晓朝译，《上帝之城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53页。

[70] 参见：特奥多尔·蒙森著，李稼年译，《罗马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7年版，第184页。

[71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周士良译，《忏悔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版，第40页。

[72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周士良译，《忏悔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版，第41页。

[73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王晓朝译，《上帝之城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79页。

[74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王晓朝译，《上帝之城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76—77页。

[75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王晓朝译，《上帝之城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144页。

[76] 参见：奥古斯丁著，王晓朝译，《上帝之城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201页。

[77] “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，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。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，到处建立君主政体，确立自由。”参见：孟德斯鸠：《论法的精神》，许明龙译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，第324—325页。

[78] 参见：梁启超著，汤志钧、汤仁泽编，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5集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8年版，第297—357。



## 要闻

团中央召开新兴青年群体思想引领工作研讨会

河南兰考构建“矩阵式”团组织体系

他们的名字如同美好青春一般闪光

特殊开学季下的“校园保卫战” 你的母校还好吗？

## 滚动新闻

第一观察 |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，就是创造新的历史

美媒：非洲裔病死率是白人的近2.5倍

特朗普的“十月惊喜”能否如愿？白宫顾问：可能性非常低

白宫疫苗顾问：如有选择 会愿意美国参加联合国疫苗协助机制

## 文化



2020北京喜剧周开启云展演，探索戏剧展演新模式



李迪遗作出版，“感情一堆，血肉一堆”



线上电影大师班开讲在即，大影节邀你与名导共话光影传奇



162天的重生路



中青报官方APP



中青报官方微信



中青报官方微博

电脑版 手机版

电子公告服务许可证 网络视听许可证0110415号 举报  
京ICP证01050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004号